

真正的战争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常 铮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真正的战争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
常 铮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40,000字
198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ISBN 7-5011-0542-1/D·93 定价：4.75 元

译 者 的 话

《真正的战争》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继其回忆录之后于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的最新著作。他在本书中阐述了他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开始了；指出这场战争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已到达了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场战争也是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战争，它是在生活和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的。在这场大战中，侵略更多的是在边界之内，而非跨越边界进行，以苏联支持的政变或暴乱的形式出现。目前，苏联防节节进逼，不断增加军费，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已从劣势变为均势，到八十年代中期，则将处于优势。这将使西方在今后二十年中面临不投降就自杀这样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因此他大声疾呼，要美国 and 西方立即大大增加军费，以防止苏联实现其不战而统治世界的野心。

尼克松从政三十余年，曾任八年副总统，于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八月任总统。他多次与苏联领导人直接打过交道，对苏联的侵略和扩张政策颇有体会，

并且有独到的见解。

应当指出，本书中的某些政治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分析。

《真正的战争》这本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我们特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一九八〇年八月

目 录

一、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了	(1)
二、第三次世界大战	(21)
三、看得见的手	(57)
四、石油咽喉	(88)
五、越南并发症	(117)
六、觉醒中的巨人	(151)
七、军事力量	(179)
八、经济力量	(243)
九、意志力量	(278)
十、总统的权力	(301)
十一、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胜利	(341)
十二、利剑和精神	(377)
作者后记	(388)

一、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了

战争失败的历史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之：太晚。
了解潜在敌人的致命目的太晚；认识致命的危险太晚；准备太晚；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进行抵抗太晚；支持自己的朋友太晚。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我最初进入国会，已有三分之一世纪，离我辞去总统职务，已有五年。

我在辞去总统职务时，有一项工作没有完成。对我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比我所从事过的任何工作的意义都大：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结构”，这种结构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既可能防止一场大战，又可以保持西方世界的安全。自从我辞职以来，美国的地位与苏联的地位相比，已大大恶化了，西方面临的危险已大大增加了。这个“和平结构”仍然可以完成，不过现在更为困难了，建立这种结构的时间也更少了。

我自从辞职以后，详细考虑了在我担任公职的三分之一世纪中，世界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没有发生变化。我还详细考虑了继我之后任总统的人们已经面临的和将要面临的挑战。美国总统掌握极大的权力。西方的命运取决于他是如何妥善地和精明地运用这

种权力。如果美国人民了解他所面对的情况，了解为什么使用美国的力量是必要的；如果他们实际上成为他在维护西方的安全和维护世界的和平方面的伙伴，他就能在运用这种权力方面取得大得多的效果。他单枪匹马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如果故意妨害议案通过的人们挡他的道，他是绝对办不到的。

在我担任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越南进行了一场痛苦的战争。在我担任总统的全部时间里，我们同苏联进行了“战争”。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同苏联进行的这场斗争将继续支配世界形势。

本书所谈的就是这场斗争，以及美国可以怎样利用它的力量来赢得这场斗争。除非我们了解这种力量的性质及其用途，否则是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我们的对手对于这些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

我曾直接地、有时是很直率地同苏联、中国、欧洲以及各大洲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打过交道。我在世界事务中既使用过武力，也运用过外交，而且看到过别人是怎样使用这些东西的。我碰到过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钢铁意志，并不得不以我自己的决心来对付他们的决心。我曾看到，他们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并将采取一切手段来得到它。

本书不仅是向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大声疾呼，而且也向各界领导人大声疾呼：趁早抓紧，集合美国的力量，以保证它的生存。

苏联今天是世界所看到过的武装最强大的扩张主义

国家。它继续以几乎比美国快一倍的速度扩充军备。苏联的意图安在，毫无神秘可言。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要战争，但他们确实要这个世界。他们正在迅速处于他们能够获得所要的东西的地位。

在八十年代，美国将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面临两个冷酷的现实。第一个是，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可能输掉。第二个是，我们可能不战而败。第二个前景比第一个前景更有可能出现，而且差不多同第一个前景一样可怕。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西方面临的危险主要不是核屠杀的危险，而是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我们发现自己面对投降与自杀——即赤化或死亡——这两者之间的选择。这种危险仍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能够避免它的时间，很快就要完了。

今后的二十年，是美国和西方发生最大危机的时期，这个时期很可能决定世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的命运。

在使用力量来维持和平方面，其它国家的经验比我们丰富得多。但它们已不再有这种力量了。因此，世界无所作为而指望美国。今天，世界以恐惧不安的心情观望着，因为一国又一国的抵御苏联扩张的堡垒垮了下来，而且因为美国看来如此举棋不定，不知所措，或者瞻前顾后，缩手缩脚，以致它已不能或者不愿采取行动了。

苏联的野心对美国提出了一种具有全球规模的战略挑战，这种挑战需要有一种新的战略意识和反应。它需要一种以明达的公众的支持为基础的有条理的国家战略。零星地应付是不行的。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安哥拉、埃塞

俄比亚、阿富汗、南也门、莫桑比克、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已统统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在过去五年中，将近一亿人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伊朗已陷于流血的混乱之中，一夜之间从西方力量的一个堡垒变成恶毒反对西方的大本营。它的诱人的石油宝藏暴露在贪婪的俄国人的眼前。古巴越来越成为苏联的范围广泛的野心的代理人。这是一些例子，说明我们如果继续采取零星处理的作法，还有一些地方会继续沦陷。我们必须恢复地理政治势头，按照一个大国的传统来集合和使用我们的力量。

旧的殖民帝国已一去不复返了。对新的苏联帝国主义，需要用一种新的反击力量来遏制之。美国自己是提供不了这种力量的，可是，如果没有美国坚强而有效的领导，则根本不可能提供这种力量。我们经不起再含糊和动摇了。我们要么象一个大国那样行事，要么我们就沦为一个次等强国，如果沦为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就休想生存下去——自由和西方的价值观念也休想存在下去。

为了使我们对苏联的挑战作出的反应有效，这种反应必须把长期措施和短期措施结合起来。它还必须把作出反应的各个方面——军事的、经济的、哲学思想的、政治的和外交的——结合起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亚洲发生的事情同在中东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战略资源和世界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经济生产率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哲学义务和民族意志之间的关系，民族意志和一国军事力量在防止冲突方面的效能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我们正在进行决定各国命运

的大搏斗。在战争中，被包围的驻军不打一枪而投降，就使驻军的被俘成为一方的军事胜利，另一方的一次失败。当苏联利用代理军队向前推进时，它的征服仍是苏联的胜利，西方的失败。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一直在不断地加强军事力量，苏联的扩张压力一直是残酷无情的。莫斯科孜孜不倦地在旧的殖民帝国解体后所留下的混水中摸鱼。它封锁了柏林，煽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革命，帮助朝鲜和北越进行侵略。它训练和资助游击队，破坏选举，击落非武装的飞机，策动政变，枪杀难民，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它威胁，恫吓，纵容，搞阴谋，搞颠覆，贿赂，威吓，进行恐怖活动，说谎，欺骗，偷窃，拷打，进行间谍活动，讹诈，谋杀——所有这些都是作为国策而故意进行的。

列宁在多年前就规定了苏联行动的基本规则：用刺刀进行刺探。如果碰到钢铁，就撤回来；如果碰到软东西，就继续下去。问题是，苏联将会碰到什么：是钢铁，还是软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美国的领导。不仅是它的政治领导。美国总统对于世界的看法是什么，他对于力量的用途和外交的细微差别了解的程度如何，他是否有战略远见，是否有实现这种远见的意志和精明手法——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甚至是绝对必要的因素。但是更广泛地说，答案在于美国领导中的几部分人，他们的态度决定美国政策所可能做的事情的限度。

不幸，美国仍然由于六十年代的遗产而遭受损害。那

时，一种狂热的反理智主义思潮席卷全国各大学，幻想居于最高的地位。对于代表已确立的制度的任何东西进行抨击，是时髦的事情。在那十年的以及在此以后的分歧，严重削弱了美国履行其在世界上所担负的责任的能力，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也在它进行领导的能力方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当反理智主义在大学里盛行时，在从专业角度考虑武器、特别是考虑武器控制的人们当中，有许多人也有一种过分“理智化”的新时尚，这就是这样一种看法：在超过某种最低限度后，你所拥有的军事力量越少越好。这就产生了一种希望：如果美国限制自己的武装，其它国家——特别是苏联——将会效法。但是苏联并没有按照这种理论行事。事实上，就在这种武器控制论得到美国理论家的赞同，并且这些理论家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这个时期里，苏联的一些五年计划规定对军费进行越来越大的增加，而这种增加显然是根据有条理的战略目标进行的。苏联没有陷入理论的泥潭；他们在力求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今天有许多人认为，美国文明患了不治之症，我们正目睹西方末日的开始。美国舆论界的一些领导人对此感到绝望。有一些人，特别是处于最黑暗的学术环境中的人们，认为这是我们站在错误一边的合乎逻辑的、早该得到的结果。就象猎狐的古典定义是“讲不得的东西追逐吃不得的东西”一样，他们认为美国是支持受压迫者的侵略者。正象剧作家尤金·约奈斯科最近访问美国以后所说的那样，美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成为“色情受虐狂者，他们愿

意为世界上的一切弊端承担罪责”。当他对美国自由派朋友说，美国并不象其它国家那么坏的时候，“这些自由派人士对我侧目而视。为了在美国受到重视，可千万别说美国人不是人类最坏的罪犯”。

美国所患的病本身并非不治之症，而是一种慢性瘫痪，如果不加治疗，则有可能成为不治之症。同我们在西方世界的盟国联合起来，我们有能力生存下去，繁荣昌盛，击退正以越来越大的力量对我们的安全进行的挑战。问题是，我们是否决心利用这种能力。

国家的存亡决定于它们怎样对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作出反应。这些挑战可能是内部的或外部的；这种挑战可以由一国独力应付，或者与其它国家协力应付；这种挑战可能逐渐来临或者突然来临。并没有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规定，不正义的人将遭受痛苦，或者正义的人必将胜利。强权肯定不能成为公理，但公理本身也不会成为强权。当一国最渴望安逸的时候，可能就是它最不能放松警惕的时候。当它最希望它能致力于满足国内的需要时，可能正是它必须赶紧对付外部威胁的时候。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它能奋起应付这种时刻，它有认识这种威胁的智慧，有击退这种威胁的意志，而且是在不太晚以前击退这种威胁。

有一种天真的看法，认为我们只要表现善意，就能够维护自由。这种看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险的。这种看法的信徒越多，对侵略者的诱感力越大。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今天，西方已进入严重危机的时期，这个时期已直接关系到它在二十一世纪中的生存。我们有物质能力，即经济和技术力量，可以获得胜利——这就是说，保持我们的自由，避免大战。但是，光有这种能力是不够的。英国游击战专家罗伯特·汤普森爵士精辟地为国家力量下了定义，认为国家力量是人力加上应用的资源，再乘上意志。我们有资源和人力。可是我们有利用它们的那种意志吗？

今天的形势非常不祥地使人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的时期，沃尔特·李普曼非常有眼光地描述了这个时期：

美国人在思想上毫无准备，就象他们在军事建设上毫无准备一样。民主国家是否能团结起来，沉着镇定，并有胆量应付严峻的考验……？它们拥有占优势的资财……可是，它们是否也有远见，有坚持下去的纪律，有贯彻到底的决心？虽然它们有手段，它们是否也有意志，它们是否知道如何利用它？……它们对事变作出反应，而不是支配事变……它们不接受它们所看到的東西，它们不相信它们所听到的情况。他们只是祝愿，等待，抱着一线希望。

国家的意志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本身所表现的意志，还有国家的敌人所看到的那种意志。在避免最后的挑战方面，敌人所看到的那种意志可能象实际的意志同样重要。虽然美国一位总统是极其不愿发动核攻击的，但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们必须始终认为他可能发动这种攻击；

并认为，如果美国或者西方的真正的切身利益要求使用核武器，他就会这样做。如果要有效地制止他们进行最后的挑衅，必须让他们看到，这种挑衅具有最后的风险。

国家的意志所涉及的，远不只是准备使用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军事力量还是常规军事力量。它包括准备拨出为保持这种力量所需要的资金。它包括对危险之所在抱有明确看法，对于为应付这些危险需要作何种反应抱有明确看法。它还包括一种基本的和十分明确的信心：美国是在这场斗争中的正确一边，我们在世界上所代表的东西是值得保卫的。

要使意志有效，它一定必须包括愿意在必要时作出牺牲——推迟实现仅仅是值得想望的目标，以便促使实现极为重要的目标；支付防务费用；招致风险；招致国内强大的选民的不悦和国外叫得很响的人们的不悦。

最近几年，美国在意志方面的失败一部分是承担世界领导担子近四十年后所产生的厌倦情绪的结果。一部分显然是越南和水门事件所造成的创伤的结果。但是更基本的是，它反映了美国领导阶层的失败。在那些自称是我们的理想的保卫者当中，有太多的人反而成为我们的退却的缔造者。

解决办法不可能是用一个领导阶层去取代另一个领导阶层。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个人可能更换，一个政党可能失势给另一个政党，不同的派别可能为知识界所喜爱或厌恶；但是从根本上说，全国期待其进行领导的那些集团，在今后的关键性二十年中，基本上是一样的。需

要做的是使那些行使领导权的人们认识到领导责任。

一九一九年，天真的林肯·斯蒂芬斯在访问苏联后兴高采烈地说，“我已进入了未来，它是行得通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其他天真的记者曾美化过毛主义的中国、越南和古巴这些“美好的新世界”。把革命浪漫化，只要专制所讲的是左派的伪善语言，就对专制使人所付出的代价故意视而不见。这种情况在进行报道和进行教导的那些人们当中是很普遍的，这在看过这种报道和听过这种教导的千百万人的头脑中留下了灾难性印记。

革命本身既不是本来就好，也不是本来就坏。可是美国今天面对的，是打着革命旗号进军的暴政所取得的进展：这种暴政以“人民”的名义，谋求用专制取代民主。但是在这些“人民民主国家”里，人民没有有意义的投票权；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没有选择。苏联建立了一个侵略性强国所曾拥有过的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这不是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也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而是为了扩大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的统治权。

对西方来说很不幸的是，美国知识界的很大一部分，包括企业界的许多人，对于克里姆林宫及其宣传家所使用的那种骗人的花言巧语为之倾倒。正象骗子知道怎样利用他的受害者的贪婪和自大一样，克里姆林宫确切地知道怎样利用它的对象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及其按照自己的影象改造整个社会这一宏伟梦想。

非洲现在已成为大国的勾心斗角的一个熔炉，因此，我们不能让我们对非洲的政策受制于曾为美国的种族平等而斗争的人们仍然怀有的辛酸记忆。我们不能让非洲成

为一个舞台，由美国人在上面演出他们的心灵创伤。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十分重要的战略性战场，因为苏联的冒险活动已使它成为这样一个战场了。

我们也不能忽视世界的任何地方，认为它离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太远，用不着管它。当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阿富汗发生的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一事实提供了自己的独特的讽刺，因为许多年来，美国记者把人们对于遥远的国家的动向进行的分析轻蔑地称之为“阿富汗主义”。阿富汗是僻远的、多山的内陆国家，那里的居民是原始的部族，这些部族是粗犷的，就象他们的国土是崎岖的一样。人们把阿富汗作为比喻，用它来代表美国读者所看到的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一切单调无味的事件。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阿富汗比这要重要得多。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阿富汗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全都在谋求建立帝国时纵骑驰骋于阿富汗的土岗与沙丘之间。一九五三年我访问阿富汗国王时，他曾为我追述，正是在阿富汗，亚历山大大帝说，“我再没有要征服的世界了。”在十九世纪，英国和俄国在整个中亚细亚交战，以争夺对这个大陆的控制权时，曾在阿富汗进行过基普林所谓的“大比赛”。

英国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岖的开伯尔山口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他们曾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为的是不让俄国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苏联扩张主义势力中的一个不祥的新阶段中的试验场。

一九七八年四月，苏联支持的一次流血政变突然把穆罕默德·达乌德总统赶下台，并使他立即被杀，取代他而上台的，是由总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领导的强烈反西方的政权。塔拉基把他的执政党更名为“人民民主党”，把他的国家改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采用的新国旗是鲜红色的，上面有党徽，旗角上有一个星——同苏联国旗几乎毫无区别。不久，政府的几乎每一个部以及十万人的阿富汗陆军，都有了苏联“顾问”，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苏联中亚细亚的塔吉克人，他们讲的方言是大多数阿富汗人听得懂的。

多少世纪来，俄国曾对它一再扩大的亚洲边界施加压力。突然恢复的这种压力，使阿富汗的已经削弱了的紧邻巴基斯坦和伊朗受到震动，这两个国家不仅由于地理原因，而且还由于部族联系，是容易受到攻击的。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都有俾路支部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西北边界省有普什图族。事实上，不到十个月以后，伊朗国王政权倒台，左派游击队首次接管了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同一天，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被人从他的汽车里拖出来杀害了。

在美国，对于苏联最初在阿富汗夺取权力的反应主要是张开大口打个呵欠。《纽约时报》社论的题目是《对喀布尔保持冷静》。“那又怎么样”派——这些人对苏联的